

通化县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化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·1 9 8 4·

目 录

- 回忆白家堡惨案 惠连芳等口述 辛恩圣等整理 (1)
- 日伪统治时期死难同胞纪念碑 满承志 (18)
- 伪满通化教育事件 县《教育志》编写组供稿 (20)
- 通化教育事件亲历记 徐云翔口述 徐华整理 (22)
- 日伪统治时期的七道沟铁矿 魏春德等口述 于开圻、刘荒、辛恩圣采访整理 (26)
- 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同盟会 罗衡口述 刘荒整理 (45)
-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六路在东来的兴起 李长奉口述 孙树发整理 (58)
- 抗日名将王凤阁 县志《军事编》编写组供稿 (67)
- 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大刀会 李长奉 (75)
- 农民会长姜乃盛的被害经过 赵庆梅等口述 刘福德整理 (78)
- 编 后 (82)
- 文史资料征集启事 (83)

回忆白家堡惨案

惠连芳等口述

辛愚圣等整理

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，日本侵略军杀害了白家堡无辜百姓四百多名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洗白家堡惨案。

白家堡子位于我县兴林乡驻地大荒沟东南五公里，是我县东北部山高林密的边缘山区。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，经常活动在这一带，宣传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。日本侵略者为孤立我抗日联军，于一九三四年实行了“治安肃正”、“集家并屯”等法西斯政策。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满抗日情绪，积极为抗联送粮、送物、送情报，配合抗联打击日本侵略者。

一九三六年六月，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率部西征时，在大荒沟胜利地伏击了日本守备队二百多人。同年七月八日，抗联一部埋伏在王志明沟小坎（打死鬼子坎）附近，击毙日本守备队十一人。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，以“通匪”的“罪名”，把白家堡子方圆五十余里划为“禁区”，对老百姓实行严密地控制和封锁。七月十五日，日本守备队围捕了白家堡子手无寸铁的群众四百余人，押至大荒沟，进行血腥屠杀。

一九六五年七月，中共通化县委、通化县人民政府在群众当年遇难的大荒沟东山根建立起一座“日伪统治时期死难同胞纪念碑”。

今年，是“白家堡惨案”四十八周年。我们重访了这次惨案的幸存者、目击者，他（她）们流着泪水回忆了当年惨案的

景象。这里发表的是他（她）们的口述笔录和李忠昌生前的回忆笔录。我们从中可以了解白家堡惨案的概貌，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，可以看到抗联和当地人民不畏强暴，英勇斗争的精神。

李山（今年七十七岁，原住孟家沟，现住朝阳三队。）

那时候，抗联经常在这一带转游，打日本兵。

在沟里，抗联雇了些大烟把头，种了不少大烟。过了德胜岗，北岔的七、八道沟，南岔的宋殿魁沟、姚把头沟，都有抗联种的大烟。

那时候，大烟的用处多啦。受伤、有病，当药用。缺粮、少子弹，当钱用。大烟土赶上现大洋（指银元）了。有了大烟土，换布匹，换粮食就容易了。就是枪炮子弹也能换着。有些伪军当官的抽大烟，抗联通过地方上的人和他们联系好，送上大烟土，到时候，他们就偷偷地送来枪炮子弹。

若不，抗联种那么多大烟干什么？

日本人知道抗联在德胜岗后种了很多大烟，他们不敢进去，怕抗联打他们。常派些密探去探听抗联的情况，找机会去祸害抗联种的大烟。

在农历五月十九那天，屯子里的牌长接户派人，让抗着锄头到村子里集合，我们家是我哥去的，当时也不知道去干什么，我上山铲地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哥哥回来了，我问他干什么去了，他说：“日本守备队和伪军领着大伙到了沟里，把抗联种的大烟好一顿祸害，用棍子抽，用锄头耪。大烟正是拉象鼻的时候，长的溜腰深，真可惜了。今天还没弄完，叫明天再去。”我一听，心里核计：日本兵这么糟蹋大烟，抗联要知道了，不能轻饶了他们，也许明天就给他们个厉害尝尝。我就和我大哥说：

“明天你就别去了。”大哥说：“不行，日本人再三告诉，明天缺一个也不行。”我说：“明天我去吧，我比你小几岁，若出个什么事，跑，我也比你跑的快。”

第二天，吃了早饭，牌长又来催人，我抗了把锄头就去了。一路上人稀稀拉拉的，都叫到自家堡子聚齐。白家堡子那里有个警察分所，我到那的时候，人不太多，警察让在那等着。

约摸七点多钟的时候，日本守备队从大荒沟来了，十一个人，还带一个翻译，后边跟了一些伪军。

警察按着各个牌清点人数，我们牌在后边，我听的清清楚楚，那天去的老百姓是一百零五人。

点完了数，就往沟里走。伪军在前边，一部份老百姓跟在伪军后边，守备队在中间，全副武装，枪上上的刺刀，还有两架机枪。守备队后边还有一部份老百姓。在最后边的还是伪军，怕老百姓往回跑。

我们后边的人刚过雷家沟，前面的人上了王志明坎（今打死鬼子坎），就听到“叭”的一声枪响。大家都楞住了，接着，看到前边的人都趴下了，后边的人就往回跑，我钻进了柳毛趟子。

后来，听前边的人回来说，前边的伪军和老百姓已经过了坎，日本守备队刚上坎，抗联就喊话：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！中国人快躲开！”紧接着机枪响了，抗联的机枪就支在王志明的老房框子里，正对着坎上的日本守备队，打得真准，十一个日本兵全打死了。翻译懂中国话，他躲起来，跑回去了。

抗联来的人不多，缴的大枪、机枪和子弹拿不了，让几个老百姓帮着往沟里送。还没过德胜岗，沟里又下来一帮抗联同志，把武器弹药接了去，老百姓就回来了。

我从柳毛趟子钻出来，想往家跑，不巧，又叫伪军堵着

了，硬逼着去抬日本死倒。没什么抬，就把老百姓的门板拆下来，把十一个鬼子的尸体抬到大荒沟守备队住的大院（现供销社）。

丛树才（今年五十七岁，原住丛家沟，现住大荒沟六队）。

血洗白家堡子的时候，我们家住在大荒沟上面道北的头一条沟——丛家沟。我们丛家老一辈子是这个沟的占山户。从搬到这条沟住时，外人就管这条沟叫丛家沟。

听我父亲说，清朝光绪年间，大荒沟归宏养保管，我大爷丛德山当过保董，外号“丛老好”。

到了日本兵来的时候，这个沟里就已经有十来户人家，是归大荒沟村管的一个牌，我父亲丛德玉当牌长，跑腿学舌，派个工，催个粮草什么的。

当时，我们家住着七口人。有我父亲，姐姐那年十九岁，出嫁了，母亲去世了，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，姐夫王德发和我们住在一起。哥哥十二岁。妹妹八岁。我九岁。还有一个老头，是我父亲的磕头弟兄，常年在我们家呆着。头一天，我舅上我们家来串门，也住在我们家。

那天（阴历五月二十七日）早晨，天刚朦朦胧亮，我大姐起来生火做饭，就听见小狗在院子里汪汪叫，我父亲到屋外一看，是村子里姓胡的一个小伙子，他说：“村长让我告诉你，昨天你们牌摊的民工一个也没去，今天一定要去，日本人不让劲了。”我父亲答应去催一催。说完，父亲就往沟里走，去催人。姓胡的小伙子就往沟外走，没走多远，狗又咬起来了。这时候，我们都起来了，往沟门一看：日本兵戴着钢帽子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，奔沟里来了。姓胡的一看不好，就往山上跑了。我们听见了日本兵骂他的声音。

我姐夫年轻力壮，怕叫日本人抓去背给养，从后窗跳出去

跑了。我父亲本来想上沟里去派民工，一看日本兵来了，他也跑了，一边跑一边告诉年轻人：“快跑，日本兵来抓人了！”

家里剩姐姐、哥哥、妹妹和我，还有舅舅和老李头。我们很害怕，老李头说：“怕什么？咱们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他不能抓咱们去背给养。”我们都在屋里呆着，日本兵一进院，我舅舅急忙把放在炕上的大吃饭桌立在了炕角上，他藏在了桌子后面。

日本兵进屋就把老李头拽下了炕，找了些晒烟绳子，把老李头、姐姐和哥哥用绳子捆起来了，看我和妹妹小，没捆。留一个日本兵赶着我们往沟外走，其余的日本兵又上沟里赶人去了。

在丛家沟门的平地上，有一家姓陈的开了个大车店。把我们都赶到大车店的院里，日本兵在院里架着机枪。我看见老梁家俩口子扒开杖柈子跑了。

一直等到快东南晌了，日本兵从白家堡子那边赶下来一大帮老百姓。把我们这些人，从陈家店赶出来，入了大帮，往大荒沟赶。一路上孩子哭，老婆叫，有病的、上岁数的走不动，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，用脚踢。

我们早晨没吃饭，我和小妹扯着姐姐的手，直喊饿。

我姑住在大荒沟南门外道边上，快走到我姑家的时候，我姐小声对我和妹妹说：“快上咱姑家要干粮吃去，别叫日本人看见。”我领着妹妹，躲着日本兵，溜出了大帮，向姑家跑去。姑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就把经过一五一十的向我姑说了。她拿了些干粮，把我们兄妹俩领到仓房里，叫我们蹲在两个装粮食的大木头筒子里。她又想去把我姐和我哥救出来，日本兵不让她靠近。大帮人过去了，我姑哭着回来了。

到了过半晌，就听着东山根一阵一阵的枪响，我姑不敢叫

我们出去，怕我们害怕，她到仓房里陪着我们唠嗑，她说：“日本鬼子杀人了，这帮不得好死的，你哥才十二岁，你姐十九，他们犯了什么罪？”我和妹妹在木筒子里哭……

一直到天大黑了，我父亲才偷偷地到我姑家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告诉我们，今天被抓来的老百姓都叫日本守备队杀了，我哥哥我姐姐和老李头被杀了……我姑搂着我小妹哭了，边哭边叫着我姐我哥的小名说：“你们死的真屈呀……”在场的人都哭了。

父亲怕我们兄妹俩在姑家再发生意外，趁着黑天，把我们领走了。在路上，父亲又告诉我们，沟里的孙大娘，因为得了伤寒病起不了炕，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。

我姐夫王德发为了报仇，投奔了抗联。

吴清林（今年八十岁，原住背阴汀子，现住朝阳六队。）

那时候，我住在丛家沟对面的背阴汀子。

我家有四口人，我和我媳妇，领一个两岁的小姑娘。我哥那年三十四岁，没成家，和我一起过，

头些日子，咱们抗联在沟里打死了十一个日本兵，我叫他们抓去抬过死倒。

阴历五月二十六那天，我们村的杨牌长到大荒沟开了半天会。回来告诉各户，明天都到大荒沟开会，日本人说去开会的人，每人放半月的口粮，回来好盖房子归大屯。谁知道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这事，谁也没往心里去。

那天晚上上下了一场大雨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媳妇起来做饭，我去挑水。到了井湾子一看，井湾子叫雨水冲的淤上了，我就用手把井湾子扒了扒。一时水混，没法挑，我就到旁边我的一块菜地里去看看。有几块辣椒秧苗，我就趁着潮乎土在那蹲着补辣椒苗，正补着苗，就听见院里有“哇啦哇啦”的说话声。

我抬头一看，好几个日本兵端着枪，冲进了我的房里，我寻思又是来抓背给养的，我就钻进草棵子里躲起来了。我不放心，从草棵子里往外看，看见日本兵从屋里把我哥和我媳妇赶到院子里。我媳妇抱着两岁的小姑娘。另一个日本兵上朱作田家，把朱作田赶出来了。朱作田那几天正闹病，出了屋，走了三、四步就倒下了，日本兵看他不能走了，从背后捅了好几刺刀，朱作田当时就死了，血淌了满地。

我们上屋的陶玉春跑出去了，我看一个日本兵进了他的屋，听见他媳妇在屋里“妈、妈”地叫唤了两声，日本兵出来时，刺刀上有血。下屋的老宋家全家人都被赶出来了，他媳妇正怀着孕，怀里还抱着个小姑娘，老宋背着一个，领着一个。日本兵把抓的人都往大道那边赶。

等日本兵走了，我先上的老陶家，到他屋一看，一炕血。陶玉春回来看他媳妇还有一口气，怕日本人再回来，把他媳妇从后窗背到树棵子里，过了一会，他媳妇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听说我哥、我媳妇和两岁的小姑娘都叫日本兵给杀了。我心里很难受。

为了报仇，我想去投奔抗联，走到半道，又叫日本兵抓去背给养，到了孤山子就病倒了。

邹绍先（今年六十八岁，原住常家沟，现住大荒沟七队。）

阴历五月二十七那天一早，就听说日本守备队要抓人，我就跑到西山躲起来了。到了东南晌，就看见守备队从横虎头（庆生）沟里往下赶人。可道拥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老的，有小的，都赶到守备队住的大院（现供销社院内），把门关上了，门外放的岗。

我下了山，就往背阴汀子跑，父亲头一天上我岳父家串门去了。不知叫守备队抓着没有。那时，我刚订婚，我岳父叫宋

德玉，他们家五口人，住在背阴汀子。

我跑到半道，遇见了王永胜，他问我干什么，我说去看看我父亲抓没抓走。他说：“你不用去了，你爹也被抓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认识我爹？”他说：“我怎么不认识？你爹耳朵上长个肉瘤子，叫日本守备队打破了，淌了一脸血。”我一听，眼泪“唰”一下子流下来了。我不死心，还想去看没过门的媳妇和岳父家怎么样了，一口气跑到背阴汀子。

进了岳父家院里，只有满院的鸡、鸭、鹅、狗在叫唤。进到屋里一看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心里一酸，趴在岳父家的炕上好一顿哭……

第二天早晨天一亮，我沈和叔叔跑到东山根，想认认父亲和岳父一家人的尸体，好归拢归拢。

到了东山根，简直不忍看，有用机枪扫的，有用刺刀挑的，有七八十岁的老头、老太太，有在怀抱的吃奶孩子，有炸掉头的，有捅破肚子的……真叫人心里难受。我们爷俩含着眼泪挨个扒拉，还没找着一个亲人的尸体，叫守备队发现了，他们把机枪架在守备队大院门口，朝我们开了枪，叔叔拉着我钻进了树裸子，奔了东山。

韩相久（今年八十一岁，原住大荒沟，现住大荒沟七队。）

那时候，我三十多岁，会点木匠手艺。

那天（阴历5月20日），听说抗联在沟里打死了日本守备队，心里挺解恨。下半晌的时候，村里派人找我，叫我去给被打死的日本兵做棺材。我说：“日本人的棺材我没做过，不会做。”看我不去，那人就回去了。过了一会，他领着李翻译来了。李翻译来吹胡子瞪眼，说话骂骂咧咧的，他说：“不做不行，小心你的脑袋。”逼我拿着工具，跟他上了守备队院里。又找了几个半拉木匠，我掌尺，一共做了三十三口棺材。先做

十一口大的，五尺半长，装上尸体浇上汽油烧了。又做了十一口中号的，半米长，他们用这个中号的装上骨灰，埋在守备队大院东头。最后做了十一个小号的，每个三十公分长，听说是用它装骨灰往日本带。带没带咱们也不知道。

过了几天，警察署的署长（他叫赵德）叫我上白家堡子下头去盖分所。他说，盖好了分所，好在那归大屯。阴历五月二十六，屋里的给我收拾了行李，准备好了吃的，打算第二天天一亮就走。那天晚上下雨，天快亮了还打雷，屋里的说：“天下雨，去也不能干，别去了。”我就没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就看见守备队往沟里走，全副武装，不知是什么，有人说去抓人背给养，有人说去赶人开会。年轻的都跑了，我没跑，仗着我会木匠活，我想，你抓我背给养，我就不能去盖房子。

吃完饭我就去老丈人家探听探听是怎么回事。我老丈人住在大荒沟街里，他叫王明信，当个小牌长（管十几户人家）。听他说，日本人头天晚上收绳子，猜摸着是上沟里去抓人，抓人干什么就不知道了。正和我老丈人唠嗑，村里来人叫他派人去蹓马，年轻人都跑了，没跑的也上山干活去了，找谁蹓？我说我去蹓。

这马，是守备队的，我牵了三四。我特意想往横虎头（今庆生）沟里走，看看守备队究竟去干什么。转过山头，刚过丛家沟，就看见守备队赶着老百姓往下走。一条绳子绑几个人，大人都绑的，只有小孩子没绑，跟着大人走。走在后边的，日本兵就连打带骂，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累的张口喘，我纳闷，日本人这是要干什么呢？

大帮人过来了，我牵着马站在道中央，看见张文财经过我身边，他没绑，我顺手把一匹马的缰绳递给了他，给他使了个

眼色，他就明白了。他假装是和我一起骑马的，等大帮人过去了，他抓山道跑了，临走时直谢我，我说：“谢什么，你快跑吧。”

这时候，我牵着马往回走，看见守备队把这帮老百姓赶进大院。随后，我也牵着马进了大院，他们知道我是木匠，不叫我走，叫我和一个姓郑的木匠钉厕所。我们扛了些板子，在靠东大墙那边钉。我和郑木匠一边钉一边核计，靠西边钉的严实一点，靠东边叫板离的宽一点，踏着板，上了大墙就能逃出去。可惜，老百姓上厕所的时候，日本兵端着枪看着，没有机会逃跑。

我们在钉厕所的时候，就听见上屋里打人的声音，守备队的官叫山口，他哇啦哇啦直喊，李翻译直逼问：“抗联在哪？”

“谁通匪？”没听见被审问的人放声。后来，从屋里推出来八个人，叫守备队打的浑身是血，这八个人就是头一天被抓来的。他们当中我就认识一个姓郭的，外号叫郭老道。当着老百姓的面，李翻译说这几个人“通匪”，日本守备队用刺刀把这八个人挑死了。把小孩子吓的嗷嗷叫唤，妇女们哭了，老百姓恨的直咬牙。李翻译叫警察把这八个人的尸体捞到后院。看到日本守备队这样杀害中国老百姓，我心里又恨又难过。我赶紧钉完了厕所，就离开了这个大院。

张秀海（今年七十一岁，原住大荒沟村，现住大荒沟六队）。

叫抗联打死的那十一个日本守备队，抬回来用火烧了，把骨灰装在小木头匣子里，埋在守备队大院的东头。坟头上用木头立了个碑，木头碑朝外这一面写着：“十一勇士之墓。昭和十一年。”中国人不让到坟旁去。

抓人那天早晨下了一阵雨，雨停了，日本守备队就往沟里

走。

我和爷爷赶着猪上了东山。东山顶上，有个我们家的老房场，我爷爷看着猪，我就收拾那个房场，准备种秋菜。

到了傍晚的时候，我在山上就看见日本守备队从沟里赶着一大帮人，往大荒沟村子里走。这时候，大荒沟里年轻力壮的人，都往西跑，淌过了河，奔了西山。后来，看到守备队把这帮老百姓赶到了守备队大院。这时天快晌了，我也饿了，想回家，又不敢回。我爷爷说：“守备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，咱们别回家了。你年轻，腿脚好，你先跑吧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能扔下你跑了，咱们在山顶上，看见日本人来了再跑也赶趟。”我们爷俩挨着饿在山上躲着。

过晌的时候，看见日本兵从守备队院里出来，在东山根放了岗，在半山腰上还架了机枪。不一会，就看见从守备队院里赶出来一帮老百姓，押到了东山根，那地方原来是乱坟岗子。我在山顶上看见老百姓一个一个地倒下了，也没听见枪响。我问爷爷：“枪没响，人怎么一个个都倒下了？”我爷爷说：那准是让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。”

刺死了一帮，又赶出来一帮，一帮能有四、五十人。我和我爷爷气的直跺脚。

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，从守备队院里又赶出来一大帮，在山顶上就听见小孩子的哭声和日本兵喊“快走！快走！”的声音。这帮能有一百多人，乱坟岗子站不下，有的站在苞米地里。这回听到了枪声，是用机枪扫的，老百姓一面子一面子倒下了。我爷爷恨的直骂日本人。他和我说：“回家赶紧把猪卖了做盘缠，你回山东老家吧，这不是人呆的地方。”

后来又听见日本兵给没死的人补枪的声音。

直到日头卡山了，守备队才收兵回去。

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黑的才赶着猪下山。走到杀人的地方，猪都不往前走了，我们爷俩绕道回到了家里。

第二天，警察按户派人去埋被杀的老百姓。先挖了七、八个大坑，每个坑都有警察记数，埋完了后，他们合的总数是三百七十四人。

到了秋天，树叶落了，在树棵子里经常看见一堆一堆的尸骨，这些都是受了重伤当时没死的人，爬出去一段后又死了。加上这些没算数的，被杀害的老百姓总共有四百多人。

惠连芳（惠连芳是白家堡子惨案幸存者，今年六十一岁，现住通化市鸭园乡。）

那年，我十四岁。我们家住在白家堡子。全家六口人，有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哥哥，一个嫂子和我。

那时候，抗联主要住在横虎头（今庆生）以里，有时候也到下面来，大部份是在晚间，给老百姓开会，讲些打日本的道理，我妈那年四十多岁，时常去开会。抗联缺吃的，老百姓想法躲着日本人和汉奸往沟里送粮食。

我的两个哥哥，头些日子就叫警察署抓到柳河孤山子修铁道去了。

就在杀人的头天晚上，我大哥从孤山子跑回来了。我妈对我大哥说：“树云哪，今晚你别在家睡了，这几天风声挺紧，听说今天早晨还抓了二、三十人押在警察署院里，你先到山上躲一躲吧。”吃了晚饭，我大哥就去山上的人家躲着去了。

我们家离大道近，我妈叫我去上屋老王大娘家躲着。那天晚上下雨，一直等到很晚很晚了，约摸不会出什么事了，我哥和我又都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妈下地做饭，就看见日本兵往横虎头沟里走。我妈赶紧招呼我爹和我哥：“你们爷俩还不快跑，日本守备队

来了！”我爹和我哥钻进树棵子奔山上跑了。老王大娘家的二小子也跟着跑了。我妈又对我说：“快上你老王大娘家躲躲吧。”我脸也没洗就往老王家跑。到了老王家还没藏好，日本兵就跟进来了。日本兵比划着叫老王大娘往外走，老王大娘说：“抓我这么个老太太干什么？”她不走。日本兵就用脚使劲踹她，把她推到院里，把我也赶出来了。

我往我们家的院里一看，妈和嫂子也叫日本兵赶出来了。日本兵用枪把子打我妈，我一边哭一边跑，奔我妈去了，嫂子跟在我妈身后哭，就我妈没哭。我们娘三个被赶进了大帮。白家堡子在家的人全都抓来了，押着往大荒沟走，路上遇见人就抓，不管是串门的，还是走道的。

到了守备队院里，就把大门关上了。院里的日本兵端着枪，上着刺刀，明晃晃的怪吓人。旁边还架着机枪，对着院里的老百姓。院里挤的满满的，有的绑着，有的没绑。天下了一阵雨，衣裳都淋湿了，我又饿又冷，我嫂子冻的直打哆嗦，我妈脱下来一件衣裳给我嫂子披在身上。

在院里，我们听到上屋有“噼啪”的打人声和日本人的说话声，说些什么也听不清。

不一会，从上屋推出来三个人，身上打的血淋淋的。我害怕，躲在我妈的身后，从我妈的胳膊缝里偷偷地往外看，看见这三个人中有我们邻居老王大爷，那两个，一个姓胡，一个姓徐。日本官（后来知道他叫山口）对着大伙“哇啦”了一阵，李翻译又说了一通，意思是，他们三个“通匪”，把他们处死。大院的东南角上有栓马桩，栓马桩底下放的板凳子。日本守备队把他们三个人架上了凳子，把绳子的一头套在他们的脖子上，另一头绑在栓马桩上，然后，把凳子踢倒，他们三个人活活地被勒死了。王大爷的舌头伸出来挺长，把我吓的使劲搂

着我妈，院里的小孩都吓哭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守备队把抓来的人一批一批地押出大院，没听见枪响。后来听说，那几批都叫守备队用刺刀给挑死了。到了日头快卡山的时候，日本守备队把院里剩下的老百姓都往外赶，有些人不走，日本兵就用刺刀捅，八十多岁的老张太太，坐在地上不起来，日本守备队当时就用刺刀给捅死了。

到了东山根，看见了先前那几帮老百姓都死在乱坟岗子上。我们这帮人多，乱坟岗子站不下，就站到旁边的苞米地里，苞米苗挺高了，都给踩倒了。旁边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，山顶上还架的机枪。我妈一手拉着我嫂子，一手拽着我，脸朝山站着。有的人想跑出去，刚一跑，就叫日本兵开枪打倒了。还没对我们开枪时，我妈把我拉在了她的前面，等机枪一响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就觉着胁巴火辣辣的痛，用手一摸，是胁巴受了伤，直淌血。我爬起来，看看我妈，我妈的脑袋炸没了，我嫂子炸去了半拉肚子，日本兵真狠，用的是“炸子”。我跪在地上，抱着我妈的尸体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妈呀，你不管我啦？我可怎么活呀？”……

正在我哭的时候，听到那边一个小孩叫我：“小姐呀，你也没死啊？咱俩一块跑吧！”我听声音是老关家的小子。他走到我身边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别哭了，小姐，快跑吧！”我们俩顺着苞米地往东跑，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我掉到大沟里，不省人事了……

我又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喊姓关的小孩，怎么喊也听不到他的回声。那沟很深，爬了好半天才爬上来，等我上来的时候，姓关的那个小孩已经走了，我再也没见着他。

爬过了岭就是小蚊子沟，我遇到了一位老大爷，我向他上

白家堡子怎么走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才从死人堆里逃出来，你可别回去，叫日本人再抓住，可就没命了。”他要我先住下，我不听，一心想回家看看。

我顺着沟往下走，一直走到河套，在河边上洗了洗脸，歇了一会，又顺着小河往上走，遇到了小桥，知道快到家了。爬过了桥，伤口痛的我直不起腰来，我一步一步地往家爬。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才到家，进门一看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小猫还趴在炕上“咪、咪”地朝我叫唤。我想起了死去的妈妈，我想起了死去的嫂子，心里象堵上块石头。我爬上了炕，打着滚放声地大哭起来……

（李山、丛树才、吴清林、邹绍先、韩相久、
张秀海、惠连芳的口述材料，是辛愚圣采访、记录、整理的）

李忠昌（李忠昌是白家堡子惨案的幸存者，已于一九八〇年病故。这篇材料是刘仲元根据他生前的口述记录整理的。）

阴历五月二十六日，日本人以送给养为名，从我们白家堡子抓走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老百姓，骗到大荒沟警察署，毒刑逼供。

第二天，天还没大亮，就听有人报信：“守备队来了！”我出屋一看，一帮日本兵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冲到我跟前。一个日本兵抓住我的胳膊，另一个日本兵朝我胸坎上打了一枪把子，把我捆起来了，接着又把我姐姐和小外甥等十多个人绑在一条绳子上。

村里的人能走的都被赶出来了，就连从外地到这探亲的沈贵山和从东丰往临江搬家的老陈家，一家老小七口，路过这里，也一起抓走了。不能走的当场刺死。日本兵赶着全村的乡亲往大荒沟走，乡亲们走慢点就是拳打脚踢，骂不绝声。